

XIAN SHI DAI DE REN

[德] 卡尔·雅斯贝尔斯 著

现时代的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现 时 代 的 人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 著

周晓亮 宋祖良 译

博 凡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92

(京)新登字 028 号

Karl Jaspers
Die Geistige Situation der Zeit

根据德文本 1955 年柏林版,并参考英文本 1951 年伦敦版译出

现时代的人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 著

周晓亮 宋祖良 译 博 凡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政编码: 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5.375 印张 138 千字

印数 00001—3200

1992 年 8 月第一版 199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317-8/B·43

定价: 3.20 元

新 印 前 言

本书写于1930年，那时我对法西斯主义已有相当了解，但对国家社会主义却几乎一无所知。尽管那时我还在为这部书稿的完成而欢欣鼓舞，但当我听到国家社会主义者在1930年9月的选举中首次获胜，仍感到惊奇和震撼。我把这本手稿搁置了一年，因为我不想让它在我的三卷本《哲学》之前问世，后一本书出版于1931年，本书比它晚了几个星期。

为了说明那个时代，我采用了那些特定年代的许多事实。在很多方面，本书都具有那个时代的气息。不过，考虑到当今哲学的处境和世界的状况，在我看来，本书在今天和当时同样正确，尽管在它问世之后，又有许多事情发生了。

在我看来，现在哪怕要对原著做一丝一毫的改动，都是弄虚作假。所以，这次新印的德文第五版的英译本（该德文版同时在法国重新发行）与1931年原版相比，只是在文体上有细微的改变，而事实则保持原样。

卡尔·雅斯贝尔斯

序 言

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人类处境的问题已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了。各代人都依据他们自己的观点，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只有少数人对我们的精神世界所面临的危险产生过忧虑。而现在，自从世界大战以来，这种危险的严重性对每个人都变得显而易见了。

不过，我们对这个题目的探讨不仅是不能穷尽的，而且由于随着我们持续关注这个课题，我们会不断对它进行修正。所以，它是不能确切限定的。我们可以认为人类过去的境况已经结束，就好像一场戏幕落铃响，宣告结束。而与此相反，人类当前状况的特点是激动人心的，那就是说，我们对这种境况的思考有助于确定它将来的发展方向。

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环境并不是最终的环境。

在很多时代，人类都认为他们的世界是永恒的，它作为不变的中介，处在已经消失了的“黄金时代”和“世界末日”之间，而所谓世界末日则是全能的神的各种目的已经达到时将要到来的。人发现了生活，并使自己适应这生活，并不想去改变它。人的活动以尽力改善自己在据信不可改变的周围环境中的地位为限。在这些环境中，他有了安全的藏身所，他实际是和天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世界是他自己的世界，即使它毫不重要，因为对他来说，真正的存在只能存在于超越的领域中。

与过去那些时代的人们相比，当今的人由于已经认识到他不过存在于被历史地决定了的变化着的情景中，因此他就成了无根可寻的人，好像存在的基础被摧毁了。既然我们认识到我们人类

过去的生活是在现实似乎被掩蔽着的情况下渡过的，所以对古人们似乎自明的生活和知识的统一，对我们就变得平淡无奇。另一方面，我们已经变得能够按事物的实际情况观察它们，而这就是生活的根基在我们脚下动摇的原因。因为，既然思想和存在的统一（迄今为止未曾改变）对我们不复存在，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的仅仅是生活，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同伴对生活的醒悟。我们不像我们的前辈那样仅仅思考这个世界。我们仔细考虑怎样理解这个世界，对每种解释的有效性都进行怀疑。而在生活和对生活的意识的每一明显的统一背后，都隐现出实在世界和我们所知世界之间的区别。正因此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运动、一个流变、一个过程中，由于这个运动、这个流变和这个过程，变化着的知识促使生活发生变化。反过来，变化着的生活又使认知者的意识发生变化。这个运动、流变和过程把我们卷入了无休止的进取和创造、得和失的旋涡中，我们在旋涡中痛苦地回旋着，大致顺从于水流的力量，但也能不时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自己的影响。因为，我们不只是生活在大体适合于人类的情景中，而且当这情景承前启后地出现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时，我们还体验着这个情景。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我们对于这个运动（我们自己就是它的因素之一）的意识具有奇怪的两重性。一方面，如我们现在所知，这个世界并不是最终确定的。既然如此，我们的希望就不再寄托在超越上，而是转向了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的尘世领域，以致我们有了对现世尽善尽美的可能性的信念。另一方面，既然（即使在有利的情况下）个人只有有限的干预能力，并且他不可能不认识到，他的行为的实际结果与其说取决于他试图达到的目的，不如说主要取决于普遍的环境条件；既然他因此而深切地认识到，与他抽象意识到的巨大可能性相比，他能发挥影响的范围是很小的；最后，既然世界的发展过程（无人对此感到满意）在很多方面似乎都不能令他满意，那么，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就弥漫开来，人们就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各种事件拖曳而行，而本来在情绪高昂的时

候,他们还希望去指导这些事件。如果一个人受宗教信念的激励,认为人在超越面前形同于无,那他就不会受变化万端的事件的纷扰。变化乃是上帝意志的结果,人们不会认为它与其它可以想像的可能性相冲突。不过在当今,以达到普遍理智为目的的这种狂妄,以及一个人自认为是世界的主宰,因此想随心所欲地塑造世界的那种骄狂,到处都可看到,而他们所受的挫折也引起了一种可怕的虚弱感。人怎样去适应这种情感并起而压倒它,这是当前形势下至关重要的问题之一。

人不仅存在,而且知道他的存在。他完全有意识地研究他的世界,改变世界以适合自己的目的。他已经懂得了,在“自然因果性”仅仅是恒常不变的、彼此类似的事物的无意识反复这一范围内,怎样去干预那因果性。他不仅象现存物那样是可被认识的,而且他本身就能随意确定什么将要存在。人是精神,人之为人所处的境况就是精神的境况。

如果一个人希望说明当前的状况,他就必须首先考察:迄今为止,人们对这状况是如何考虑的?它是怎样出现的?一般所说的状况是怎么回事?它表现为哪些方面?当今对人性问题是怎样回答的?人类的发展前途怎样?对这些问题回答得越明白,我们就越能确定不移地经认识而摆脱无知,就越能迅速达到使人自身实现为独立的个人的那些极限。

1. 时代意识的起源

人对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批判与人的自我意识一样久远。我们自己对当代的批判植根于基督教关于历史过程的概念。按照这种观念,历史过程乃是向着完成某种拯救计划而发展的。虽然我们已(基本上)抛弃了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对时代的态度不是从这个概念中发展出来的,就是对立于这个概念而产生出来的。根据这种观念,当时机成熟,救世主就出现了,而这标志着历史的结

束。此后，人类只好等待和准备最后的审判。尘世的末日将会到来，因此它已变得无关紧要。与反对这个观念而提出的各种思想相比，与关于事件发生的循环论思想相比，与有关世界帝国的重要意义的思想相比，基督教的理想由于其普遍性、唯一性和在它所孕育的历史中的不变性以及它和救世主人格的关系，而对个人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虽然对基督徒来说，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是整个尘世，但是他们具有决定性特点的时代意识却极大地加强了。

这种历史概念是超自然的。就早已发生了历史事件而言，它们是人类的堕落、摩西的启示、上帝的选民犹太人的传教活动以及预言的实现等等这些事情的不理解的结果；或者就尚待发生的历史事件而言，它们仅仅和还在迫近的世界末日相关。这个世界内在的变成了实质上是非历史性的东西，因为据信它和历史无关。但是，如果这种超越的观点变成另一种观点或被另一种观点所取代，而后一种观点（尽管它把人类历史的唯一性含义保持不变）把世界当成一个运动、一个内在的进程来考虑，那么人的心灵中就会苏醒起一种意识：他们自己的时代和前此的一切时代是有所不同的。他们最终会受到一种信念的激励，相信（也许是自发而难以觉察的，也许是经他们自己有目的的努力）会有某种独特的东西从这时代中产生出来。

从16世纪以来，时代之链连续不断。由于这种连续性，随着人类世代的更替，时代的意识也一环接一环，从一代人传到另一代人。这种连续性是从人类生活小心翼翼的世俗化开始的。古典学术的复兴，连同艺术和科技领域中新体系新成果的出现，都是由一群对整个欧洲都有影响的文化人实现的。这些革新者的情绪在乌利希·冯·胡顿(Wrich Von Hutten)的话中得到了表达：“心灵在苏醒，生活是乐事。”那是一个发现的时代。世界的全部海洋和陆地都已为人所知；新的天文学诞生了；近代科学发端了；伟大的技术时代露出了曙光；国家机构正变得合理化(Rationalisierbarke-

it)*。进步的思想得到表达,在18世纪达到它的顶峰。在那以前人们展望那个时代时,时代是向着世界的末日和上帝的最后审判日发展的,而现在,人们都期待着文明的完善化。卢梭决心戳穿这个自我满足的假像。1749年,当人们要给论艺术和科学有助于提高公共道德的最佳论文授奖的时候,他回答说,艺术和科学败坏了道德。他从此发动了对艺术和科学之进步的拥护者们的穷追不舍的批判。

这种时代意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时,它作为自认为是时代的真正代表的少数人的精神生活,首先指向魅力十足、制度严谨的政治生活,然后指向人的存在本身。于是就生产了这样一种思想根据:鉴于迄今为止的人类生活已经被实际接受,人类理性就应该能有目的地塑造生活,直到生活变成它应有的样子。法国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由于它被看成是人类在理性原则指导下左右自己命运之新时代的开端,所以它一开始就博得了欧洲思想领袖们的热情欢呼。

早前的任何革命都没有改造人类社会的审慎意向。例如,笛卡尔没有反叛他的国家的法律和惯例,而只是大胆思考着人类内心的革命。他声称,把国家夷为平地,然后着手在全新的基础上重建国家,这种国家改革计划是毫无意义的。即使17世纪的英国革命[德国作家以此指英国历史学家所说的大叛乱(1642—1660),而不是指1688年的议宪革命]也是植根于宗教和国家的强盛感之上的。新教无疑通过回复到基督教的基本原则而使基督教得到更新,但这里绝无世俗化的企图。正相反,宗教改革者愤慨的是教会已经变成了世俗机构。克伦威尔的铁甲军是通过他们的主帅而为上帝效力的,正是他们对改革后的信仰具有的满腔热情激发他们英勇战斗,使英国人(上帝的选民)为上帝增了光,并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这时,理性完全被看成人类社会的毒草而被无情铲除

* 此处英译本译为“民族化”,可能是把 Rationalization 误排成了 Nationalization。

并付之一炬，在这之后的法国大革命则是以依据理性原则重建生活的决心为推动力的第一次革命。悠久崇高的传统不再行得通了！法国革命者的唯一先驱是来自英国的流亡清教徒，他们想在大西洋彼岸完成他们在本国未竟的事业。而在世俗进程不断深化的时代，这些坚定的斗士已经发展到颂扬人权说的地步了。

法国革命出人意料的结果，是它经历了一个适得其反的变化。决心给人以自由变成了对自由的可怕的摧残。反革命的势力集聚着力量。敌视革命，一心防止革命复发，成为一切欧洲国家的主导原则。但不论怎样，一旦革命已经发生，人们就对他们此后要为之负责的那个生存基础感到不安，因为这基础可以有目的地加以改变，可以重新塑造得接近人的内心的要求。康德在1798年所作的预言直至今日仍然适用：“历史上的这种现象是不能被人忘怀的，因为它揭示了人性中更完美事物的雏形及人使其完全展现出来的能力。而在此之前，任何政治学学者都未能从以前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推演出这一结果。”

事实上，自从法国革命以来，就流行着对该时代的时代意义的一种特别新颖的理解。但在19世纪，这种理解被一分为二了：一方是对光辉未来即将来临的信念，另一方面是对无法摆脱的深渊的恐惧。但是，当人们开始把他们的时代看成是过渡的时代时，由于这种看法从来就对精神上的虚弱有满意的镇定和安抚作用，于是一些人对未来的希望淡漠了，另一些人的恐惧也缓解了。

我们现在考察的这个时期一开始，黑格尔哲学就形成了一种历史化的时代意识，这种意识以异常灵活而有说服力的辩证法反映了无比丰富的历史内容。这种辩证法带有一种效果，使人相信当前的历史时期具有独特的意义。辩证法根据人类意识自身来揭示其变化。意识的每一次搏动都是内部意识推动的，每一次认识都使认知者发生变化。由于这种变化，认知者必须在他的世界中寻找有关他自身的新知识。意识之流就这样向前奔腾不息，因为存在与存在的意识是割裂的，它们就必须以变化的方式不断更新它

们的分离状态，从一种状态变到另一种状态。古今的人类历史进程就是如此。黑格尔无比充分而深刻地证明了这个进程是如何进行的。人类自我意识的这种骚动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得以明确，尽管它形而上学地隐藏在把一切暂时的个别都寓于其中的精神整体性中。因为在精神的整体性中，人类历史知识的暂时冲动变成了彻底的永恒宁静。

现行的存在和意识的辩证法(对此，在纯理智的层次上是无法恰当理解的，我们只有在我们内心做到了如下颇为重要的一点，我们才能充分地把握它，这就是：通过精神对自我性的要求，使精神具备获得崇高性的能力。)被贬低了，这是由于人们固定地把存在和一种人为地简单化了的人类历史过程——被人们设想为仅仅由物质生产条件所决定的历史过程——连在一起。显然，我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辩证法衰落为一种单纯的方法，既没有历史的人类存在方面的内容，也没有形而上学方面的内容。这样一来，辩证法的确使对一些问题的系统阐述成为可能，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又促进了与某些特定历史和社会问题有关的卓有成效的探讨。但在同时，它又散布了一些假冒科学的流行口号，因为这些口号是形式，在这形式下，原来设想的那种深邃的历史的时代意识变成了人们随意转手的假币。最后甚至连辩证法也被抛弃了。于是，针对经济唯物主义式的简单化倾向和把人的生存归结为盲目竞争的物种等观点，人们起而反对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各种各样的观点中，真正的历史的时代意识消失不见了。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世界史的概念是现时进行自身理解的一种方式。但这里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一心只注意当前，忽视了具体历史的远景财富。费希特在他的《现时代的基本特征》一书中早已提出这样一种批判观点：尽管黑格尔的方法是从始至终抽象地构造世界历史(就像基督教历史哲学的世俗化一样)，但他仍把目光盯在基督教哲学的核心上，在那里，现时被看成是罪恶最终完成的时代。克尔凯戈尔是第一个对他的时代进行全面批判的人，

这一批判因其认真诚挚而与前此尝试的一切批判都截然不同。他的这一批判是适用于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的第一个批判，读着它，好像它只是昨天写成的。它使人类面对虚无。尼采的写作要晚几十年，他不熟悉他的前辈克尔凯戈尔的那些著作。他注意到欧洲虚无主义的出现，无情地诊断出它的症状。对于他们的同代人来说，这两位哲学家似乎是荒诞不经的——是没有人会对其认真看待的耸人听闻的预言家。事实上，他们是觉察到已经存在但尚未引起普遍忧虑之现实的先知。只是在我们今天，他们才被当作探讨当代现实问题的思想家而受到称赞。

与克尔凯戈尔和尼采的时代意识相比，整个 19 世纪的时代意识都是朦胧的，但在许多方面它在觉醒。大多数公众以文化和进步为满足，但是具有独立思想的人却充满了不安的预感。例如歌德写道：“人类将会变得更加聪颖敏悟，但不会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幸福、更加充实。我预见到那一天，不帝不再喜欢他的创造物，他必将再次毁灭这世界，创造一个新的开端。”1830 年，尼布尔（Niebuhr）由于受七月革命的惊吓，发出了这样的哀叹：“如果上帝不给我们奇迹般的援助，我们就会面临迫在眉睫的毁灭，如同接近公元三世纪中叶时罗马帝国所遭受的毁灭一样。那时，繁荣、自由、文化和科学都完结了。”塔利兰德（Talleyrand）说，只有生活在 1789 年以前的人才能品尝一切生活的甜蜜，而一个多世纪后的我们，则又把 19 世纪初期看作平静美好时光的继续。因此，当每一代人想到在以前的黄金时代，人们都曾受到同样悲观预言的困扰和折磨，他们就为面临的毁灭前景不寒而栗。1835 年，托克维尔^①（Tocqueville）认识到民主的到来不可避免，因此他在研究民主的性质时，关心的不是想怎样避免民主，而是怎样尽量减少它的弊病。他和其他许多人把民主当成一种蛮人入侵。布克哈特（Burckhardt）^②想到它的侵袭就无比厌恶。在此之前，1829 年，斯

^① 托克维尔：十九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学家，著有《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已出版其中译本）。

汤达 (Stendhal) 冷静客观地观察了这一事实,他写道:

“在我看来,不出一个世纪,艺术感就将被自由所消灭。艺术感是非道德的,因为它使我们陷入疯狂的爱,陷入怠惰和浮夸。如果让一个有艺术气质的人主管开凿运河,那么他不会以工程师特有的冷静的理智来从事这项工作,总之他会把这项工作搞得一团糟”。

他还写道:

“两院制将遍及世界,给美术以致命的打击。统治者将不是去建造可爱的教堂,而主要关心的是在美国投资,以便在政府更迭时,他们能在那里舒适地生活。两院统治一实行,我首先预言,两院决不会连续 50 年投资二十万元去建造象圣彼得教堂那样宏伟的建筑;其次,我预言,在两院的统治下,上流社会将挤满了富翁,他们无疑是可尊敬的,但他们不会受过能使他们获得美术鉴赏力的教育。”

他劝告想在世上出人头地的艺术家们放弃艺术,去经营糖厂和制陶厂,因为那样他们将“更可能变为百万富翁和国会议员。”我们在兰克 (Ranke) 于 1840 年写的日记中读到:

“在以往的时代,崇高的信念就是法则,是各种伟大奋斗的基础。当今的人们则以发布宣言为满足。于是任何事情都没有成果,一切都证明是半途而废。那些人所做的事情仅仅是表达政党的观点,由此获得有效的支持”。

政治家卡沃尔 (Cavour) 同研究者托克维尔一样,认为民主的到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位意大利政治家在 1835 年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们不能再欺骗自己了。社会正在大踏步地向民主迈进……。贵族正在没落……。在当前社会的结构中,不再有贵族阶级的地位。我们有什么办法来阻挡群众的洪水呢? 对

① 布克哈特,瑞士历史学家,著有《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化》(商务印书馆已出中译本)。

此没有任何可靠、有效、经久的办法。这件事是喜还是忧呢？我无法说明。不管是喜是忧，据我的想法，它是人类无法逃避的未来。那么让我们对它做好准备，至少使我们的后代对将发生的事情有所准备……。现代社会体现了向着民主发展的预定进程，掩盖事件发展过程的任何企图都只会引来暴风雨，这暴风雨无助于我们把航船引入安全的锚地”。

因而，上一世纪从各种各样观点思考人类前途的人，都受到一种危机感的冲击。人类感到他的未来处于危险之中。正如基督教相信现在的世界是失去的世界，因而抱定将世界看作超越的拯救之说不放一样，许多认为他们的时代似乎注定毁灭的人也通过对本质的思辨的肯定，来寻找避难所。黑格尔相信这个时代是腐朽的，因而认为现实本身（非独哲学）需要补偿。他说，哲学作为人类的补偿不过是一种部分或外在的普遍化：

“就此而论，哲学是一个独立的圣堂，它的牧师组成了一个必须与世隔绝的独立教团，其职能是保证对真理的占有……。直接实践方面的问题不为哲学所关注。”

席勒写道：

“就肉体而言，我们希望成为我们时代的公民（实在说来我们对此无可选择），但就精神而言，我们希望逃避特定时间的桎梏，成为全时代的人（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上），这才是哲学家和富于想象的作家的特权和职责。”

另一些人试图把他们的同胞带回到基督教。以格鲁德维希（Grundtvig）为例，他说：

“我们这代人也许是站在历史所知的最重要的岔路口上。旧路已经消失，新路依然朦胧。没有人能解开未来之谜。当日月星辰全都消散，天空像旋涡一样翻腾时，除了在牢不可破的圣经中，我们又能在哪里找到心灵的安乐呢？”

但是克尔凯戈尔的观点与此大相径庭。他向往原始纯洁的基督教，因为唯此才能于我们的时代有所裨益。基督教应当因那个

人的受难而得到复兴，但这个人当今却被群众抹杀了。克尔凯戈尔不愿因为在牧师或教授的可靠职位上飞黄腾达而使自己堕落。他没有散布客观科学或哲学。他没有成为一个鼓动家或改革的实践家。他没能告诉他的同代人他们应当做什么，而只是能使他们感到他们正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

以上摘引的 19 世纪上半叶有关时代意识的文字记录，我们还可以找出无数来，以表明近代批判的主题至少存在了一个世纪。在大战之前和大战期间，出现了两部最出色地反映我们时代的著作。它们是拉森瑙（Rathenau）的《时代的批判》（*Zur Kritik der Zeit* 1912）和斯宾格勒（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1918）。拉森瑙的书分析研究了当代生活的机械性。斯宾格勒的著作是一部哲学史，它提供了丰富的观察材料，并试图证明西方世界的衰落是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这两部著作的特点是：资料实在、采取确证有据的方法，涉及面广，不强调他们关于人类面对虚无的看法。在这方面，克尔凯戈尔和尼采仍然是带头人，尽管克尔凯戈尔已发现没有任何追随者支持他的原始基督教，尼采的查拉斯图特拉哲学也未被普遍接受。但由于两人都是那种有毁灭倾向的揭示者，因此只能指望战争来引起人们对他们的学说的前所未有的注意。

无疑，人们普遍相信：人类活动是徒劳无益的，一切事情都大可怀疑，人生没有什么东西能保持完美，生存无非是由各种意识形态造成的互相欺骗和自我欺骗的无休止的漩涡。因而时代意识与存在分离，仅仅关注于自身。持这种观点的人不能不受他自己的虚无意识的冲动。他在领悟到毁灭这一结局的同时，也领悟到他自己的生存就是虚空。这种时代意识在此空虚寂寞之中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2. 当前境况的根源

当前的人类状况作为过去发展的结果，并考虑到它将来的可能性，已经成为从未如此紧迫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人类衰败毁灭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真正的人类生活即将开始的可能性，在这两种对立的可能的抉择中，前景是晦暗不明的。

不仅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以前，而且在传统开始以前，人类从前人类到人类的转变就已完成了。经常地而非偶然地使用工具，取火和用火，语言的产生，以及使结伴和持久社会的基础得以可能的对性妒嫉的抑制，所有这些使我们的祖先超出了动物界。在采取这些造就人类之决定性步骤以前，有几十万年为人们所无法了解的史前期，与这个时期相比，延续只有六千年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是短暂的一瞬。在那些悠久的年代里，人类以各种方式生活着，散布在地球上，互不相识。西方人（他们征服了世界，使各地的人互相联系，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共同的人性）则似乎依靠三个伟大原则的一贯运用，从整个人类中脱颖而出，发展起来。

第一个原则是坚定不移的理性主义。它以古希腊科学为根据，对经验材料进行检测和计量，进而在技术上把握它们。例如：普遍有效的科学研究；由于罗马法的系统化而带来的法律决断上的可预见性；计算被用于经济事业，并达到使所有经济活动合理化的程度（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是通过理性化而加以把握住的）。这些都是由于受逻辑思想和现实经验的支配而产生的结果，就象它们本身向一切时代的一切人所展示的那样。

第二个原则是在犹太预言家的说教、希腊哲学家的智慧和古罗马政治家的行动中十分明显地表现出的自我存在的主体性。我们称作个体性的东西，在西方人中是沿着这些途径发展的，并且一开始就和理性主义相互关联。

说到第三个原则，我们在西方人中发现了一个坚定的信念：

世界是时间中有形的实在。这个信念是与东方人的“非现世”信念相对立的。后者是由这样一种情感引起的：非存在也许是作为存在呈现给我们的根本的实在。西方人认为，确信就是对这种有形实在的确信，它只能依这实在而产生。认识并力图主宰实在的自信有两个源泉，那就是自我存在和理性主义。

只是在近几个世纪，这三个原则才得到了发展，直到19世纪才真正进入它们自己的世纪。人类可以到达地球的任何表面，空间被征服了。人第一次能在这星球上住在他所要住的任何地方。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对空间、时间和物质的技术主宰不可阻挡地加强了，而且不是通过偶然孤立的发现，而是通过有组织的合作，在此过程中，发现本身被系统化了，并服从于有目的的努力。

在人类文明沿着相互独立而曲折的道路发展了几千年之后，最后的四百五十年经历了欧洲人对世界的征服。这个征服过程在最后一百年间完成了。在这个决定性阶段加速发展期间，出现了许多独立而杰出的人物。他们洋溢着领袖的自豪感，能工巨匠的自我陶醉，发现者的激情，审慎而大胆的冒险精神，达到最终目的者的心满意足：由此出现了与象这样揭示出来的世界极为亲近的关系。不过，现在我们感到这个扩张的世纪对我们已经结束。一种相反的情绪已经出现，由于这种情绪，尽管积极的成就依然存在，但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那些巨大而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是十分顽固的。客观的征服运动似乎已经停止，我们不但不再前进，反而趋向于退缩。

西方人的指导原则同有关一成不变、循环发生的概念格格不入。理性告诉我们，每一新的认识都蕴涵着认识进步的可能性。实在并非自身存在而已，它必定要被主动获取知识的认识所把握。年复一年，有关的运动加快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一成不变，一切事情都发生了疑问，并尽可能地被改变了。而近来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以19世纪所不知的内在冲突为代价的。